

1 小学课本叶圣陶写、丰子恺画

1912年，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辩论。蔡元培在《自写年谱》中回忆：“范君说：‘小学没有办好，怎么能有好中学？中学没有办好，怎么能有好大学？所以我们第一步，当先把小学整顿。’我说：‘没有好大学，中学师资哪里来？没有好中学，小学师资哪里来？所以我们第一步，首先把大学整顿。’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，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，没有一方面不整顿。”

当时的教育课本，倾注了巨大的心力。不管是从日本、欧美留学的，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长大的文化学者，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，像蔡元培、胡适、鲁迅，他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。《开明国语》的民国课本，由叶圣陶亲自编写，丰子恺负责插画，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。

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，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，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，但他们都要反复考量。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，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。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，大家就因为用“来来来，来上课”好，还是“去去去，去上课”好，争得不亦乐乎。因为“来”字笔画多，“去”字简单点，但是不够亲切，最后选的还是“来”。

文化上的民国热是否该降温虽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，但民国教育以及文人风骨，却是一道精神风景线。

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民国文人为保护文化命脉，在炮火中南渡西迁；在时局与学术中，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。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所说：“唯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一



民国文人 真名士自狷狂

◀ 民国清华大学四导师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梁启超（从左到右）

2 边吃包子边答辩

民国取士，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制度，即便是北大、清华这样的高校，选学生也是以才为主，不拘泥于严格的考试程序。

卢沟桥事件爆发后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等校南迁，在湖南长沙筹组“临时大学”，也就是后来的“西南联大”。1939年开始恢复招生，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，报考者须先交论文，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，笔试之外还有口试。

周法高获得考试资格后，在重庆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，由于答辩时间很长，午间他一边吃着包子，一边回答老师问题。他的作答不仅没有引起反感，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，建议他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，由此奠定了成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基础。

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，西南联大不拘一格，唯才是举。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，发表了许多小说，尽管从未当过教员、讲师、副教授，也未去国外留学，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。没有职称和学历就被聘教授，陈寅恪也是个特例，1926年春天，应清华大学之聘，陈寅恪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。

在这之前，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，胡适坚辞不就，并推荐了梁启超、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。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，曹说：“他是哪一国博士？”梁答：“他不是学士，也不是博士。”曹又问：“他有没有著作？”梁答：“也没有著作。”曹说：“既不是博士，又没有著作，这就难了！”梁启超生气了，说：“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好吧！你不请，就让他在国外吧！”

3 教授的地位比校长高

1931年，梅贻琦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，他认为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在有关办学的重大事宜上，当别人问起他的办学主张时，他常说：“吾从众。”他充分尊重教授的治校意见，他常说：“教授是学校的主体，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。”为坚守民主治校，西南联大坚决反对“官本位”意识，就连称呼上，西南联大只有“先生”、“学生”两种称呼，学校教职员一律称“先生”或者“某某师”，而不会有“某院长”、“某处长”、“某主任”之称。著名民国研究作家岱峻说，在民国时期，都会称某某教授兼任某某院长，行政职务放在后面。

1939年，陈立夫为教育部长，政府规定：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，都得是（或要成为）国民党党员。对此，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。法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：“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，我就不做这个院长。”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授是国民党党员后，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，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。

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“教授治校”，针对传统学校“老爷式”作派，他将陈独秀、胡适、梁漱溟等一批饱学之士聘请入校，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，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，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。凡学校法规、学科的设置与废止、课程的增减与改革、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，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，方可实施。

4 刘文典斥沈从文：我是替庄子跑，你跑什么跑！

自古文人相轻，但文人身上的傲骨，在民国时期更加突出。

据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，王叔岷的《庄子校释》刚完成时，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，他却不用。胡适做北大校长时说，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，只有狼才是一群一群的。

民国文人的傲气，不仅在于毫不掩饰的赞扬，更在于明目张胆的无视。西南联大时期，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。白话文的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，除了原有的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杨振声，还来了陈梦家、李广田，最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来气的就是“乡下人”沈从文。刘文典公然讲：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该拿四百块钱，我该拿四十块钱，沈从文该拿四块钱。”

他甚至不顾场合奚落沈从文。有一次，警报一响，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，刘文典当然也跑，跑不多远，他忽然想起他“十二万分”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，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。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，大声叫嚷着：“保存国粹要紧！保存国粹要紧！”这时，他扭头一看，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“乡下人”（沈从文）跑得比谁都快，立即就恼火了，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，转身呵斥道：“你跑什么跑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，我要死了，就没人讲《庄子》了！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。就你这么个人，还跑什么跑！”

刘文典的狂傲是出了名的，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，为学生运动的事，他当面顶撞蒋介石，不称“蒋主席”，竟敢当面叫他“新军阀”。傅斯年也敢在蒋介石面前跪二郎腿，桀骜不驯，然而他在乡下却十分谦和。在李庄时，有区长、镇长请傅斯年吃饭，饭碗摆好，他一坐下，刚拿起筷子又站起来，看看轿夫桌子上的菜是否跟自己的一样，如果不一样，他站起来就走。

虽然居高自傲，但是民国文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。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，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，生活也很困难，但他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。有一次，朱自清得了痢疾，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，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，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。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，拉了30多次。第二天，他脸色蜡黄，眼窝深陷，人都脱了相，可他连脸都没洗，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。

普通人看民国： 生活就是乱和穷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一 张俊其

在文化上的民国热中，我们看多了张爱玲穿旗袍的不可睥睨，林徽因的才貌双绝，民国“四大美男子”的气度，清华国学四导师的异彩……可在当时的普通百姓看来，民国留给他们的，更多是战乱和贫穷。

命都保不了，还谈什么教育

民国范儿？1932年出生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高级教师章宏礼却陌生于这个词语，因为在他的童年里，到处是动乱和烽火。小时候他住在浙江三门县，日本人经过时，他随堂哥逃到乡下去避难，从此居无定所。

“我今天在这里呆两天，过几天又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这样过来的。连生命都保证不了，哪谈得上教育！”他记得邻居在上海一家味精厂当职员，厂是外国人开的，不是日本人的，因为这个，日本人就把他的宅子全烧光了。

71岁的王云记得，三四十年代，街上很乱，到处都是打仗的，普通百姓不敢出门，飞机在头顶上轰鸣，就把床支高一点，全家躲在床底下。后来战争越来越激烈，只好躲到地窖里面。“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。”王云那时候才5岁，经常看到有胆大的人跑到街上抢面粉，因为很饿，连危险都顾不上了。

“当时物资非常短缺，我们院里有蔡老师，是小学的教师，他把书都撕掉当柴火，在院子里偷偷烙饼，实在是太饿了。后来，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，爸妈就领着我们挑着担子往姥姥家走，像逃难一样，很多人都扔掉了不需要的东西，路上乱七八糟的，也没人捡，命是最重要的，东西都不重要了。”王云说。

“农村没地的，就在秋收的时候拾粮食去。村里有个人，一直到18岁，连衣服都没有，夏天就赤身露体。”80岁的山东警察学院退休教授张复天回忆，那个年代，贫穷和灾难剥夺了人的尊严。

六年级毕业已经很有文化了

山东水利勘测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黄贻生出生于湖北省石门市，当时县里只有两所中学。公立的学校只招收两个班，一共120人，非常难考。“我没有考上公立学校，就读私立的，可是私立学校的学费贵一倍。”黄贻生记得，那时候不交钱，交实物，两担稻子，四个箩筐，有二百多斤，一般家庭完全负担不起。

“那时候能学完高小已经是很有文化的人了。”80多岁的赵黎平说，当时上学用的是国民党自编的国家标准课程课本，分为初小和高小。初小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，一共学八册书，高小是五年级到六年级，学第九到十二册书，一个镇上就一所高小。

“高小不好考，你要是考不上还可以到初小再上学，然后接着考，很多人都留级五六年才考上。”章宏礼初中毕业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“文化人”，他说，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校生活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。

“1949年冬天，我在三门中学初中毕业，那是县里唯一的中学。你想象不到那时的中学条件有多差，初中毕业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什么是烧杯、什么是试管、什么是显微镜。”章宏礼说，球场是在竹林里开出来的一片场地，有松树，篮球架就是利用南北两棵松树做的，在松树上面拴上一个铁圈。“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现在所说的民国大师，大学离我们太遥远，更何况是他们，我们过的只是普通的生活。”